

# 论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

张亚群, 王 毓

**摘 要:** 从完整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既是专业教育, 亦是通识教育, 本质上具有“专业性”和“通识性”的双重属性。二者贯穿于高等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教育过程之中, 发挥各自的教育功能。从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专业性”与“通识性”的地位及作用呈现时代、国别和层次的差异。培养创新人才, 需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 变革教育教学方式, 开发和优化核心课程资源, 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培育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高等教育; 专业教育; 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4-0142-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4.017

高等教育的属性研究, 与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课程选择密切相关, 既是理论问题, 也是实践问题。现代高等教育基本特征之一, 就是学科分化与专业发展, 由此奠定专门人才培养的基础。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又具有通识教育的属性, 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培育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探析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的关系, 不仅可加深对高等教育本质特征的认识, 矫正高校办学的片面性, 也有利于提升通识教育的地位, 推动大学通识课程改革与大学生素质教育发展, 全面改善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 一、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辨析

高等教育是什么, 它具有哪些本质属性, 这是值得深究的学术问题。全面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 离不开对教育历史发展和教育哲学的考察分析。前者从人类教育活动的演进轨迹中, 归纳和把握高等教育的一般特征; 后者则从理性认识的角度, 领悟和界定高等教育的基本内涵。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指出: “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藏在历史发展中一样, 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sup>[1](P3)</sup> 潘懋元先生认为: “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当我们努力探讨和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功能时, 不能忽视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sup>[2](P25)</sup> 正是这种历史的、哲学的研究, 使人们不断深化对高等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

20 世纪 40 年代, 布鲁贝克在其教育史著作中论析高等教育的特征: “高等教育是与社会文化的更高级阶段的教育相关的。它不仅以最深奥的术语来探讨现实的文化, 而且作为最高级的学习阶段, 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领域里占据着一种既有一定难度又令人振奋的地位。”针对高等教育这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BAA100015)

作者简介: 张亚群,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福建 厦门 361005); 王毓,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特性,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大学应该是一种给学者提供的、以评价已知的知识和探索未知的知识的专门场所吗?” “大学应该全部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 或者它还提供普通教育?”<sup>[3](P456)</sup> 这些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

在布鲁贝克看来, “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异在于教材的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 它“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 这使得两者的性质不同。“高深学问”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迁, 导致高等教育的界限变动不居<sup>[1](P2-3)</sup>。“一旦这种高深的专门知识运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时, 就会出现许多中间性的职业及相应地许多中间水平的学问。”<sup>[1](P76)</sup> 由于这种新型知识得到承认和扩展, 使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扩张, 囊括“中学后教育”、“第三级教育”等机构。通过对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合法地位”的探索, 布鲁贝克揭示高等教育兼具专业教育与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的特征。

由于划分标准的差异, 有关高等教育的概念, 国际学术界并无统一的严格定义。196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洲召开的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界定: “高等教育是指大学、文学院、理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教育而言, 其基本入学条件为完成中等教育, 一般入学年龄为18岁, 学完课程后授予学位、文凭或证书, 作为完成高等学业的证明。”<sup>[4](P289)</sup> 这是对高等教育一般特征的描述, 并未揭示其本质属性。实际上, 各国对高等教育性质、内涵的认识不一, 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和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 “专业性”是其本质属性。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在性质、任务上, “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 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 二是在教育对象上, “一般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学生的年龄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他们的身心发展已趋于成熟。”<sup>[5](P3)</sup> 他认为, “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专业所必要的基础知识、技能, 以及专业知识、技能, 而不是普通文化科学知识。”<sup>[6](P94)</sup> 新版《辞海》释义“高等教育”为: “中等教育阶段以上的大学文化程度的专业教育”<sup>[7](P681)</sup>。依此而论, 普通教育只是作为高等教育的必要基础, 而不属于高等教育的范围。

实际上, 从教育的本质属性来看,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既有差异性, 也有共性, 后者不应被忽视。哲学上所谓“属性”, 一般指实体的本性, 亦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本质属性是某类对象的有决定意义的特有属性。就逻辑关系而言,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都属于教育的下属概念, 都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是两者共有的本质属性。从完整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既是专业教育, 亦是普通教育 (通识教育), 本质上具有“专业性”和“通识性”的双重属性。二者贯穿于高等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教育过程之中, 发挥各自的教育功能。当我们探讨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时, 如果抽去它与普通教育共有的教育本质属性, 那么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就会失去基石, 在实践中必然发生功能异化。

在近代大学教育史上, 不少西方学者都论证了自由教育、普通教育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作为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 约翰·亨利·纽曼认为, 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 其目的是理智培育, 担负着哲学教育或自由教育的功能。经过训练的理智, “能赋予它所从事的每一种工作和职业以威力和光彩, 使得我们更有用, 并对更多人更有用。”<sup>[8](P1,87)</sup> 在中国, 蔡元培、梅贻琦、郭秉文、潘光旦、竺可桢等教育家, 融会中西教育理念, 倡导培养通才, 建构了大学通识教育的新传统。

从实践层面来看, 对于高等教育性质的不同认识, 往往导致通识教育的定位差异, 制约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课程安排与实施成效。正如有的论者指出, 将高等教育界定为“专业性教育”, “是从学科立场出发的, 只是一种科学的概念或观念, 仅仅揭示了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特殊规定性这一事实, 因而是有限的观念。以此来认识和指导高等教育实践, 不能在根本上提升高等教

育的品质,也不能使高等教育达到通识境界。”<sup>[9]</sup>相比之下,认同高等教育兼具“专业性”与“通识性”,则有利于保障通识教育的应有地位,推进大学素质教育发展。这也是原本“主要在普通中小学进行”的普通教育,“近期来许多国家强调在高等学校也必须加强实施”<sup>[10](P1196)</sup>的原因所在。

## 二、专业性与通识性之关系

“专业性”是指专业教育或专门教育的特性,它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专门人才为目标,与知识分类、职业取向密切相连。“通识性”则指通识教育的特性,它以人格养成和心智培育为目的,为各科教育所通用。作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专业性与通识性孰轻孰重,学术界颇有争议。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既有差异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发挥各自的功能。

首先,在起源上,高等教育的“通识性”先于“专业性”产生。人类教育史上,先有传授基础文化的一般教育,后有探究“高深文化”的高层次教育或高级教育。作为培养较高层次人才的社会活动,高等教育须有“育人”的属性,才能谈得上“专业教育”的属性。人的培养始终贯穿于高等教育活动中,离开了“教育”,“高等教育”无从谈起。

其次,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高等教育的通识性与专业性相互依存,前者寓于后者之中。通识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共有的教育,具有普遍性;专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产生的较高层次的教育,它具有特殊性,并存在一定的学科差异。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的整体。“通识教育必然包含专业教育,但又超越了专业教育。”<sup>[11]</sup>正因为如此,早在19世纪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曾任美国总统)伍罗德·威尔逊就指出:“我们的专业人员所获得的自由教育决不能只是他们接受技术训练之前的教育,而必须与技术训练同时进行。”<sup>[1](P93)</sup>这也表明,在高等教育阶段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须同步实施,不可偏废。

不仅如此,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随着时间迁移,本身也会转化为通识教育。如布鲁贝克所言,狩猎和钓鱼曾是实用性的活动,但经过一定时间后,它们变成纯粹的竞技运动,其本身成了目的;数学最初只是测量和建筑等某些行业的一种工具,但最终它本身也成为一种目的,融入自由教育的科目<sup>[1](P96)</sup>。近代科学教育一开始更多的是以技术性和实用性的教育内容为世人所重视,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科学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理智内容,也使之逐渐成为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从功能上看,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虽存在明显差异,但不可分割,共同发挥培养人才的作用。七十多年前,哈佛大学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曾指出:“就整体教育而言,通识教育通常关心学生是否成为负责的人或公民,而专门教育则留心学生在特定职业的竞争力。但人生的这两个面向无法完全区分开来。”<sup>[12](P56)</sup>这一结论至今仍未过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颇有借鉴意义。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学科分化和学科综合越来越多,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强化对专门人才的社会责任、文化素养的要求。因此,只有兼顾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从历史实践来看,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之地位及作用,呈现时代、国别和层次的差异。总体而言,中世纪大学注重满足社会对专业的期望;文艺复兴后,自由教育观念占据大学主导地位;19世纪中期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地位上升,科学研究及社会应用受到各国重视。就国际比较而论,拥有悠久自由教育传统的西方近代大学,比东方近代大学更重视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层次,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比一般本科院校,如文理学院、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更为重视专业教育。

近代英国,在“新大学运动”兴起与传统大学转型的重大变革中,曾出现自由教育传统与新兴

科学教育(专门教育)之间的激烈争辩。自由教育的捍卫者约翰·亨利·纽曼认为,“教育是一个崇高的字眼”,大学教育应提供普遍性的知识(具有普通意义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识,而不是狭隘的专业知识。“大学不是铸造厂,不是制造厂,也不是一项单调的工作”。他觉得把大学称为“教育场所”而不是“教学场所”要更确切、更符合习惯<sup>[8](P64)(P33)</sup>。与此同时,伴随德国大学新概念的传播和达尔文进化论等科学理论的问世,科学教育不仅在英国“新大学”生根,也逐渐成为牛津、剑桥大学的新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入通识教育的内涵,高等教育开始突破精英教育的藩篱,通识教育的受众面扩大。英国大学通过不同的课程设置,将通识教育的精神贯穿课程的目标、结构、内容及其实施诸环节。

美国近代高等教育先后移植和借鉴英德模式,但经过本土化发展,在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上后来居上。就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而言,布鲁贝克曾列举美国几种代表性观点:“今天人们重视使一个人的高等教育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获得某种统一的世界观(彼得斯,1978),甚至更为重视高等教育专门化”;而“有些人仍然把高等专门教育看做是自由或普通教育的一种转移”<sup>[1](P93)</sup>。当今美国,一方面,以通识教育为导向的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广为流行;另一方面,以专业(主修)或专门教育为主的研究院和专业学院在高等教育领域享有崇高声望,两者呈现同步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

美国通识教育之所以有此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与其自身教育特点及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布鲁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需要重视普通教育的三个缘由:“对普通教育持广阔的观点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必须不仅为工作作好准备,而且要为工作变换作好准备。”第二,“当我们考虑到学生未来所要起的公民作用时,广博的见解也是为普通教育所必需的。”第三,我们共同生活所需求的闲暇时间增多,而利用闲暇时间的最有益的方式之一,“是为了学术本身从事学术研究”<sup>[1](P95)</sup>。这些见解颇具参考价值。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梅贻琦、潘光旦在《大学一解》中系统阐释“通识”与“专识”、“通才”与“专家”的关系以来,有关“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论述不断出现。梅贻琦提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因此,他主张:“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坚持“通重于专之原则”<sup>[13]</sup>。这种通才教育的理念,在梅贻琦主政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以及同期其他大学,如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大夏大学等院校,不同程度得到了实践,取得显著的育人成效。

改革开放后,潘懋元先生大力倡导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方面强调高等教育的专业性特征,另一方面呼吁转变“教育思想”,倡导“改进的专业教育”。他提出:“现代化的科技人才应该是既通又专,在通的基础上有所专,掌握了专门知识又能融会贯通。”为此,需要优化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最优化的知识结构应该是:第一,有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第二,有一定深度的专门知识;第三,对学科前沿和相邻学科动态趋势有所了解;第四,具有必要的横向学科的基本知识;第五,具有一般的文化素养。在智能结构方面,也要通专结合,即一般智能与特殊智能结合。”<sup>[14](P185-187)</sup>同期,夏禹农、汪永铨、蔡克勇、文辅相、李翰如教授等也对“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关系做出新的探析,通识教育再一次受到注意与重视<sup>[15](P354)</sup>。这些论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取向。

通过对通识教育的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国内学术界加深了对高等教育专业性与通识性的本质、功能、地位及二者相互关系的认识。从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的办学实践来看,“通识教育是造就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础”,“实施通识教育,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学习者通向成功之路”<sup>[16](P310)</sup>。有的论者从社会分工与知识分化、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知识更新、职业活动的

需要等方面,论证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教育”<sup>[17](P240)</sup>。也有研究者指出:“通才教育可以依托专业教育,专才教育则通常排斥通识教育。”<sup>[18](P234)</sup>在现实需要和教育理念更新的大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高校逐步推广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导向的通识教育。

### 三、通识教育教什么与怎样教

加强通识教育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特殊形态的通识教育,与美国等西方大学所实施的通识教育,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只是在演化路径、实施方式和课程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sup>[19]</sup>。从人的培养来看,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什么样的“通识”以及如何培养“通识”。推进大学通识教育发展,需要完善课程设置,解决通识教育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汪永铨教授曾提出:“中国的通识教育可能会包括这样一些组成部分:德育;中国历史与文化;西方语言与文化;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育;美育;生产劳动和有关的社会事件等等。”<sup>[15](P357)</sup>二十年过去了,我国高等教育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40%,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和培养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成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在国家政策层面,不久前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sup>[20]</sup>。这些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目标和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为了培养创新人才,我们需要变革和完善大学课程体系,优化通识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方法。

其一,以经典阅读和核心课程为载体,传承文化遗产,促进大学生心智发展。

通识教育涵盖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实践三层面,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辅以校园文化熏陶等隐性课程。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优秀文化传统;在课程实施上,藉由经典传授和核心课程教学,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文化遗产包括中外历史文化经典。国外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应该反映其所在国家的知识系统,这一要求在全世界是同样有效的。”<sup>[21](P436)</sup>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与孔子的《论语》这类的世界经典,“它教导学生处处思考和感受人类关心的那些具有深刻意涵和基础性的事物,跨越众多的学科、文明和时代——不是简单地重现过去,而且也想象未来。”<sup>[22]</sup>经典阅读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就在于经典常读常新,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之间,架起了人类智慧沟通的桥梁。

其二,教育内容须跨越学科界限,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能力与方法。

一般说来,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富有独立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一的专业教育所能实现的,它需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任鸿隽认为,科学在教育上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sup>[23](P67)</sup>潘懋元先生指出:“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这里除了有知识以外,还要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人生观。”“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如意志力、恒心。”<sup>[14](P184)</sup>当今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质要求日益提升,个体要成功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多项才能。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日趋综合,大学教育更需注重通

识基础,融合不同学科文化,才能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其三,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学习”,使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内化为学习主体的意识和自觉行为。

中华文明是一种“学习”的文明,对于教育有独特而深邃的理解。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先秦儒家认为,“学”是第一位的,“教”是第二位的,“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篇都在讨论“学”,而不谈“教”。《学记》则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强调讨论式学习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源(《孟子·离娄下》)。从先贤倡导的“言教”、“身教”,到当今兴起的“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教”的形式千变万化,而“学”的本质则一以贯之,这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发展。这也是当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应有的基本要求。

其四,探讨现代社会问题,培育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高等教育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大学通识教育只有结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广泛探究社会发展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才能培养出能够关注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非功利的教育,通识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人文关怀、人格养成与价值观陶冶,是提升个体素养,凝聚社会共识的主要途径,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教育特征。通识教育内容广泛,而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内容。好的通识教育,乃是在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方面凝聚共识的教育,为社会和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代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些基本内容成为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导向。增强社会凝聚力,需注重国情教育、民族和谐教育,加强民主与法治教育,重视诚信教育,建立和完善诚信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守信和睦的社会环境。

总之,通识教育课程应该具有思想性、广博性、系统性和文化深度,不仅传播知识,拓展文化视野,而且更应训练理智,陶冶情操,给人以多方面启迪。完善大学通识教育,迫切需要变革教育教学方式,开发和优化核心课程资源,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通识教育,对于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和知识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凝聚社会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为重要。

#### 参考文献

- [1]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第3版)[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2] 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3] [美]约翰·S·布鲁贝克.教育问题史[M].单中惠,等,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 [4] 该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 [5]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 [6]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 [7] 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第六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 [8]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9] 刘振天,杨雅文.论“通识”与“通识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1,(4).
- [10]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11] 易红郡.英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及路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4).
- [12] [美]哈佛大学委员会.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M].谢明珊,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

- [13]梅贻琦. 大学一解[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41, (1).
- [14]潘懋元. 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1.
- [15]汪永铨.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A]. 露丝·海荷. 东西大学与文化[M]. 赵曙明, 主译.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6]张亚群. 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 [17]李曼丽. 通识教育: 一种大学教育观[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 [18]李剑萍. 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第2版修订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19]张亚群. 大学素质教育: 通识教育的特殊形态[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 [20]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光明日报, 2016-03-18(11).
- [21]吴庆麟.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卷)[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0.
- [22][美]约瑟夫·斯科特·李. 大学院校中的核心文本——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与孔子的论语[J]. 大学教育科学, 2014, (1).
- [23]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任鸿隽文存[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孙 洁)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平台正式开通

自2000年创刊以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秉持“倡导绿色文科,逐步打造全刊单一主题综合性品牌学报”的特色,将“多学科研究资源环境问题的国内高端学术平台,广受学界尊敬的新锐文科学报”作为期刊定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先后荣获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湖北省精品期刊等荣誉;同时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11年特色栏目“资源环境研究”入选教育部“名栏工程”;2013年底,通过整合国内相关高校学报资源,牵头创办了《资源环境研究》专题网刊(刘传红同志出任主编)。

为推进期刊数字化建设,促进编辑部与广大作者、审稿专家、读者的联系,我们近期正式开通了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zhongguodd)。此微信公众平台拟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定期发布本刊的学术动态、刊发的学术论文,以求更好更便捷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欢迎扫描关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平台二维码!



## MAIN ABSTRACTS

### **Distinction between EIA and SA's Denotation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Perfection — A Reflection on Environmental Laws Based on Tianjin Explosion Accident**

HUANG Xi-sheng, HE Jiang

The confus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and Safety Assessment (SA) is rooted i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where these two assessments have an overlap. They have similar assessment technologie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connection in the source of institutions, and they have the same management systems because of their identical functions. The basic principle to clarify the denotative meanings of these two concepts lie in their difference in emphasis: SA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voiding personal and property risks, while EIA emphasizes ecologic risks. Although an “integrated risk assessment” that combines EIA and SA has been tried in practice, the cost of this innovative measure is rather prohibitive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China. The society will gain more real benefits if the Safety Assessment Law is enacted and the “integrated risk assessment” expert consulting system is established. It is advisable to guarantee the rationality of professors by standardizing assessment procedure and accountability and to realize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rough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public hearing.

###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ow-carb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IAN Yun, ZHANG Jun-biao, CHEN Chi-bo

This paper uses DEA-Malmquis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low-carb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and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Tobit model is then used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ang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provinces where the level of low-carb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high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while the western provinces show low level in th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solute differences of respective low-carb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30 provinc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uch five groups as very fast, fast, average, slow and slowing down in terms of their speed in action. 2) In promoting low-carbon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frontier technology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whil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s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 scale efficienc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3) Before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with farmer-benefiting policy was released,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in the country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primary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factors; After that, it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agricultural public investment, opening degree of agriculture,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s. For different areas, whether in the same stage or no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agricultur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different.

### **On the Professional and General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ZHANG Ya-qun, WANG Yu

From a holistic view, higher education is bo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with dual properties of being professional and general. They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 in education ideals,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ettings, teaching modes, and education processes.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ir position and function show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times, nations, and levels. To develop innovative talents, we should integrate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educational modes and teaching methods, discover and optimize core resources of curriculum, expand learning in scope and depth, and cultivate common core values.